



新闻记者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新华出版社



新 闻 记 者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王 庚 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Голосовский Игорь Михайлович
Х ОЧУ ВЕРИТЬ

本书根据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2 年版本译出

新 闻 记 者

〔苏〕伊戈尔·戈洛索夫斯基 著

王庚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3/4 印张 135,000 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203·002 定价: 0.50 元

内 容 提 要

新闻记者阿列克赛，被编辑部派往某地采访。写一篇关于地下斗争的特写。他根据党政机关和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写好了特写，却意外地发现了新的线索，与上述事实不符。被认为是叛徒的女共青团员，原来是一位爱国者。他为了追求真理，找到确凿的证据和证人，往返奔波，备受艰辛，遇到重重困难，受尽冷嘲热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为女共青团员恢复了名誉。

本书故事生动，情节紧凑，语言简朴，风格明快，作者用文学手法表现了“要无愧于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值得重视。

故事发生在我到普里别尔斯克出差的时候。报社编辑部派我去，是为写一篇描写沦陷期间地下爱国者同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特写。

这个题材，是莉季亚·格里高利耶芙娜·达拉辛果娃提示给我的。她以前参加过某个地下组织，现住莫斯科。她给我讲了她的战友们许多动人的故事，并且告诉了我其中几位的姓名和住址。

我在普里别尔斯克呆了有两星期，访问了历史博物馆、省委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会见了不少现今还活着的游击队员及烈士的家属。

回到莫斯科，我就着手写作，但一时难以动笔。我是同妈妈、妹妹卡秋莎住在一起的。房间不大，只有十八平方米。在我出差的时候，妹妹也出嫁了。

她的丈夫维达利，我很早就熟识，当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只是新婚夫妇住在我们家，对我的工作不大方便罢了。

编辑部责任秘书，了解到我的困难以后，给我搞了一张雅尔塔疗养院的疗养证，对我说：

“你还没享受过假期。这次去，边休息，边创作，也是件颇为惬意的事。现在是十月底，那儿人不多，不会有人打扰你的。”

一路上，我脑子里尽在想我将要写的文章的结构。

到达辛菲罗波尔的时候，天气还很炎热。天空湛蓝湛蓝的，完全和夏天一样。

而在莫斯科，我动身的那一天，刚刚下了今年的头一场雪……

华西里·费道洛维奇说对了：雅尔塔游人稀少，仿佛沉入了甜蜜的梦乡。看到这个繁华的南国都市，这样安宁和静谧，确实使人惊奇。只是在黄昏时分才可以看见，那些穿着深色衣服、体格健壮的男子，同他们雍容华贵的夫人，在明朗的海滨沙滩上散步。

疗养院设在市郊树木葱郁的公园里，几乎完全是空的。偌大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一安排就绪，我就动手写起来。

通常在下笔之前，我总是踌躇再三。写了一张又一张，起不好头。而这一次，一坐下，文辞语句就象自己跑出来似的，非常顺利。

这个材料，真是太有趣了！

工作吸引着我，使我废寝忘食。只用了一个星期，文章就写好了。篇幅相当大，有十六个打字页。从报纸版面上考虑，是够长的了。可是，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它们摘要发表。所有的话，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

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重新回到我写的事件中去，因此，只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

一九四一年，德国法西斯刚占领普里别尔斯科市，城里便出现了地下市委书记格奥尔基·拉库钦柯领导的地下爱国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有：留下来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久以前还在念书的中学生，从敌人集中营跑出来的战俘。他们炸毁了铁路桥，弹药库，使敌人的冶金厂，未能投入生产。

城里还有一个地下印刷厂，定期出版报纸。一九四二年六月，政治警察局的间谍突然发现了这个地下组织的行踪。市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们不幸被捕了。

同时被捕的还有总部委员留德米拉·柴柯夫斯卡娅。战前，她在中学教德语。普里别尔斯克沦陷后，她留下来负责组织团市委的工作。这位美丽的姑娘，沉着冷静，大胆无畏。拉库钦柯对她很器重，没想到她却是一个叛徒。刚一被捕，她就向德国秘密警察出卖了四位正在从事破坏工作而尚未被敌人发现的同志。他们是：奥斯达普·吉姆丘克、谢苗·卡耶伏依、华西里·卡鲁什卡和塔拉斯·米哈列维奇。由于柴柯夫斯卡娅的告密，这四位同志全都被捕了。没过几天，就被敌人处以绞刑。德寇很快又枪毙了拉库钦柯和别的几位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但是，其中却没有柴柯夫斯卡娅。她消失了。显然，她是由于叛卖有功，被敌人从狱中放出去的。

普里别尔斯克光复的时候，政治警察局的档案全部保存下来了。德寇仓皇逃命，没有来得及烧毁。档案中有柴柯夫斯卡娅的供词。她向德寇乞讨活命，并供出，炸毁铁路桥是吉姆丘克、米哈列维奇、卡耶伏依和卡鲁什卡干的。

这样，她的叛卖行径就非常清楚了。

我把稿子重新打印了一份，寄回莫斯科，只把底稿留了下来。我的假期这才正式开始了。总算能够休息几天了。可是，天不作美，象故意似的，阴雨连绵，一下就是十天。

我实在呆厌了，决定牺牲假期，尽快飞回莫斯科。可是，明天的机票卖完了，因为疗养院的旅客都要急着走。我买了一张十一月六日的夜航机票，希望能和亲人们在十月革命节的大喜日子里团聚。这样，在雅尔塔我就还得再等三天。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的寓所的窗前，就是海滨浴场。当我坐在打字机旁边写作的时候，我经常欣赏那些游泳的人被太阳晒红了的皮肤。现在，我也可以洗一洗，晒晒太阳了。反正飞机票已经有了。

通往海滨浴场的地方，修了一层层陡峭的石级，磨得又光又滑，仿佛涂了一层油。我下到一家小吃铺前面（里面正在烤羊肉馅饼，闻得见大葱的焦味），脱了靴子，兴致勃勃地把双脚沉到冰冷的浅水里。

我在水里站了好大一会。海水光彩夺目。碧绿、淡灰、银白，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水花激溅在石头上，一霎眼便消失了。海涛前呼后拥地扑上沙岸，懒洋洋地不忍离去。

在一块光滑的圆石上，坐着一位姑娘，身穿湖蓝色的游泳衣，下巴支在膝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她的黧色面容，有点象东方人。黑黑的眉毛，褐色的眼睛，一头蓬松的、轻飘飘的金发，配上她那南方人特有的脸庞，显得无比的娇美。

脱掉衣服，一头栽进水里，……差点没把我冻僵了。海水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柔和，想不到却会象冰一样冷。我一个箭步，又赶忙跳回到岸上。

姑娘笑了。她的牙齿，又白净，又齐整，尽管稍微小了些。

“这点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小声嘟哝了一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姑娘打石头上站起来，着手梳理她的散发。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发从她手里滑出来，披在眼睛上，绞在十指间。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们理顺，盘在脑后，抿紧嘴唇，用长长的发针别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戴上了她的绣花游泳帽，从从容容地下到冰冷的浅水里。

我被战败了。三年前，在新闻系，我还是个游泳好手呢。而如今，水稍微冷了点，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咬紧嘴唇，重新扑到水里去，神气十足地一直呆到姑娘上岸为止。我跟着她出水，用一只脚跳着，装出耳朵里灌满了水的样子。实际上，我

的确冻麻木了。

姑娘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为她建立了多大的功勋。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我，虽然我一直在她面前蹦蹦跳跳。她不慌不忙地穿上了蓝底白花的连衣裙，弯下腰，套上了银白色的凉鞋，走上台阶。她的被太阳晒黑了的小腿，端丽、修长，腿上细白发亮的汗毛，清晰可见。她的步态是那样轻盈飘逸，仿佛没有触到地面一样。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想着那位姑娘。第二天早晨，天刚一亮，我又来到了海滨浴场。糟糕，天气又变坏了，又下起了讨厌的蒙蒙细雨。

吃完早饭，我到市立公园去散步。那儿有一个象棋馆。我想下几盘棋，消磨时间，没有心思再去想那位姑娘了。当然啦，我怎么也料不到会在这儿又碰见她。

她坐在窗子旁边，正同一位胡须满脸的大胖子下棋。胖子喘着气，棋子拿在手里，半天才走一步。我站在胖子身后看他们下。胖子败局已定，没有挽救的希望了。一分钟后，他站了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走错了一步！嘿，嘿，您下得蛮不错呢。”

他带着庄重的神气离开了。我向姑娘问了好，对她说：

“我同您下一盘试试看，行吗？”

象棋比赛，以前我曾得过亚军。当然啦，那是中学生比赛，我总还认为自己下的不错呢。最初几步，我走的沉着，稳健。在我的对手突然将车移到老将的侧翼后，我觉得已经稳操胜券了。她大胆地露出老将，一直攻卒。我心里暗喜，小心翼翼地布好阵势，等待她进攻时受挫。但她突然丢了象，保住了卒。我沉思起来了。我的阵地，这一下可不难攻破了。再走了三、四步，黑棋的四个小卒没过河就被吃掉了。

我困惑地看着棋盘。姑娘背靠在椅子上。我注意到，她好象很痛苦的样子。

“输了，”我说，连黑象都没有拿。这样做，显得更得体一些。软弱的棋手是不易发现埋伏的。

第二盘，虽然进行得仍很激烈，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仍以我的失败告终。

“谢谢您，”姑娘说着，站了起来。

“再下一盘好不好？”

“不，我要走了。”

她真的走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问她叫什么名字。

明天，就是我在雅尔塔逗留的最后一天了。

雅尔塔的清晨，是多么令人愉快，多么清新宜人呵，我甚至舍不得走了。从海面上吹来了暖洋洋的风，轻轻地摇曳着窗前洋槐的叶子。从海滨沙滩上传来了打排球的声音和球场上惯有的嘈杂声。

我走上阳台，一眼就看见了昨天下棋的那位姑娘。她身穿游泳衣，头戴浅蓝色的游泳帽，体形窈窕，端丽，踮起脚跟，以优雅的姿势扣着球，从容不迫，犹如她下水游泳一样。她下棋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我凝神注视着她，足足看了有好几分钟，然后回到寝室，收拾行李，准备起程。“我明天就要走了，她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但过了一会，却又身不由己地来到海滨浴场。姑娘看见了我，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

她身上完全没有如我昨天看到的那种骄矜神情。我进了球场。一分钟以后，我同她以及别的人，都象很早以前就熟识了似的。

我们玩够了，又一起跳进了冰冷的水里。我赶上了那姑

娘，在她的身边游着，问她叫什么名字。

“玛莎。”她一面说，一面笑着，撩起水来，成把成把地往我身上洒。

穿上衣服以后，我邀她一道去看电影。她马上拒绝了，态度这样严厉，使我大为窘迫。但很快又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同我谈起了下象棋。她的脸儿，又显得彬彬有礼了。

“您今天还去象棋馆吗？”我问。

“要去的。”

“您不会骗我吧？”

玛莎惊奇地抬起她那黑黑的眉毛，看了我一眼。

但她到底还是没有来。我白白地等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沿着海岸来回走了四次，希望能够碰上她。但没有见到她的面，显然她把刚才说的话忘记了。

在回疗养院的路上，我顺便到邮局去买报，不期突然遇上了她。她坐在凳子上。一双俏丽的黧黑的小手，无力地放在膝上，若有所思。头耷拉着，歪在一边。嘴唇闭得紧紧的。目光疲惫无神。整个姿势，使人感到她象正经历着什么痛苦似的。

我走到她跟前，问：

“您为什么骗我呢？”

她慢慢地抬起眼睛，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泪水。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小声地说，“出了什么事吗？”

“是的。”她简短地回答说。

“也许我可以帮帮您的忙吧？”

她摇摇头。我好象应该走了，但总觉得不大对劲。意识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走了，就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我又问道：

“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吗？”

“是这样，”玛莎懒洋洋地解释道：“我接到一份电报…明天就应该回莫斯科。可是飞机票卖完了。”

“那您一定拍了电报，说明天回不去啦！”我一下子便猜中了。

“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您的电报还没有发走呢！我们去看看！”我拉着玛莎，直往邮局走。她驯顺地在后面跟着。

“您贵姓？”我们一路小跑来到拍电报的窗口，我问玛莎。

“萨波日涅柯娃。”

玛莎的电报，果真还在电报员的桌子上放着呢。

“开头就应该拿定主意嘛！”穿着邮局制服的女电报员，不高兴地说，一面把正要拍发的电报退还给我。

我把电报给了玛莎，又拉着她走到街上。

“怎么办呢？”她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飞机票，在她面前一伸。

“那您自己呢？”

“我星期六再走。星期一也行。那有什么关系！您别担心我。”

她的眼睛快活地闪烁着。

“谢谢您。”

“我们快到票房去。”

飞机票上换成她的名字，没有费多少功夫。玛莎把票钱给了我，我们就从票房出来了。

我们在沙滩上慢慢地走着。一种羞怯的感觉，不时袭上我的心头。刚才匆匆忙忙地办事，我并没想到，这会有什么不好。而现在，我确信玛莎一定会笑我。“用这种方法跟人相识，未免太不象话了。嗨，这个年青人，真有办法！”她一

定会这样想。

我很想邀她随便到那里去走走，看看电影，或者是喝杯咖啡什么的，不管怎样都行。但心里直嘀咕：这在她本来是很容易拒绝的，也许她连跟我一块走也不愿意呢！

“您还急着有别的事吗？”当感到沉默使我很不好受的时候，我问了这么一句。

“不……”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她飞快地回头看了我一眼，便埋下了眼睛。这就是说，我做得过火了！她的眼里，明显地露出嘲讽的神情。

“我们还可以再下下棋。”我试图纠正自己刚才的错误。

“不，最好去吃饭吧。我很想吃点东西。”她平静地回答道。

我们走进少年餐厅。一位肥胖的小提琴手，同一位弹吉他的中年人，正在如痴如醉地演奏着“卡拉巴”舞曲。餐厅里几乎是空的。

“我们喝香槟吧？”

“好的……我冷得要命。”

“那喝点白兰地……”

玛莎没有回答。我失望地沉默着。同她在一起，我总觉得局促不安。不知怎的，脑子里尽想的是一些淡而无味的客套话。一开口，总是拘拘束束。玛莎很讲礼貌。我完全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喝了一杯香槟酒，问道：

“难道您不去上班吗？您可以在这儿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吗？”

我向她说明了我的工作性质。

“啊，您原来是记者！”玛莎尊敬地说，“多有趣的职业

呵！您都写些什么呢？”

“比方说，我刚刚写完了一篇关于本市地下工作者的特写。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卓越的人物！您将来读读报纸就可以知道了，用不着我来罗嗦。我的文章很快就会见报的。”

“不，还是请您亲口讲一讲！”她请求似地说，带着警觉的语调。我本想开个玩笑掩饰过去，可玛莎坚持要看，以至达到使我惊奇的地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底稿，递给她：

“您想看那就请看吧，……不过，我写得很不象样子。”

……她读着，我从一旁偷偷地留神注视着她。最初几页，她很快地翻了过去；接着，好象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又翻到第一页，从头读起。她的脸儿，变得阴郁起来了。没有读完，就把稿子一页页理好，递给我。

“您喜欢吗？”

“没什么，您写得倒真不费事！”她的声音变成一种陌生的、带有敌意的语调了。“不过，请原谅，我要走了……”

玛莎站起来就往外走，一点也没留神，我是不是也跟在她的后面走了出来。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她住的疗养院门口，才停下来。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您帮了我的忙，我应当感谢您。”玛莎冷淡地说。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不过，我不打算问了。反正您也不会告诉我。让……我不会死乞白赖地硬要同您认识。不过，这样分别，使我心里很难过。再见！”

我扭头就走。

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好一个任性的女孩子！为了这次相逢，我狠狠地骂了自己一顿。好心好意，却碰了一鼻子灰，活该！

可为什么她的态度会突然改变了呢？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我起得很早。疲惫不堪，一肚子闷气。我又来到海滨浴场。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昨天那几位男女青年仍在打排球，可一切都仿佛换了另外一个样子似的。

我脱掉衣服，一头栽进水里，游得老远老远。海水对我来说，已不觉得冷了。

这个奇怪的姑娘在我的文章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晚上，我用了半个钟头时间，仔细研究了她读过的地方。任何特别的东西都没有。可她为什么……我想来想去，总是想不通。

直升飞机的马达，发出嗡嗡的声音。它飞得很低，几乎是从我的头顶掠过。从机舱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见飞行员的头。我看到，他弯着身子向地面上某人招手。也许是向我吧，谁知道呢！

三天以后，我又回到莫斯科了。

二

华西里·费道洛维奇在走廊上碰见了，对我说：

“您回来了，很好。去看小样吧。”

“怎么？已经排好了？”我高兴地问。

“排好了，排好了。”华西里·费道洛维奇回答说。“应该感谢西德政府的头头们。真的！这帮法西斯匪徒又在蠢蠢欲动了。要叫他们记住，我们曾经怎样狠狠地揍过他们。你的特写，描写的是地下斗争，正合适！”

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接着又加了一句：

“除此而外，还有，您写得不坏，很有水平。”

从责任秘书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是令人高兴的。他是老一辈的报人，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编报纸。他很少夸奖人。在这以前，还总是责备我写起来随意发挥，或者，那就更糟，对我写的东西，他保持轻蔑的沉默。

我从校对科拿到小样，下了楼，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大厅里读起来。文章印出来，同手稿相比，好象变了另外一个样子，考究得多了，不象手稿那样平庸和拙劣。

我首先发现的是修改过的地方，或者，删掉的句子。自然，我觉得改的不合情理，特写不象原先写的那样好。

但这些都是小事情，我心头的喜悦，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减少。我拿着这些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厚厚一叠稿子（总共六十栏，占两个版面），爱不释手。我的名字以黑体字印在标题下面。

要知道，名字是在标题下面，而不是在文章的末尾呀！

我在报社工作已经十年了。虽然也不时发表文章，但总不是经常如此。而且，以前写的，充其量不过是通讯报道之类。现在，我的第一篇真正的特写就要问世了。我想起了，责任秘书怎样劝我到雅尔塔去，我又是怎样向他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只怕搞不好，空手回来。我觉得自己是胜利了。

我在小样上签了名，送给责任秘书，问他：

“你知道哪一天可以见报呢？”

“星期天吧。”他不大高兴地说，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

我回到编辑室，从桌上拿起了在我出差期间堆积起来的一大叠读者来信，一边看着，一边作复。可是我的思路总是跑得很远很远。眼前仿佛出现了登着我的特写的报纸。他们将怎样安排这篇文章呢？这倒是挺有意思的。是以两个专栏的形式登在第三版和第四版呢？还是以四个通栏的形式登成“柱子”形

的长条条？

给读者的信，写上地址，封好，我便回了家。

雪花轻轻地飘着。我感到惊奇，昨天我还游泳呢。

回到莫斯科以后，我连一次也没想到过玛莎。有时，脑子里会闪现一些不清晰的画面：海滨的沙滩，从岩石岸上下来的小姑娘，捏在黧黑色手指间的棋子，——这些只是一闪而过，并没引起我太多的怀恋。

“你到底回来了！”妈妈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我说。“有个姑娘给你来了四、五次电话。该不是新找的对象吧！”

“哪个姑娘？”

“不知道。她留了电话号码在这里。”妈妈把电话簿子推给我看。头一页上，新添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号码。

当晚，我就按这个号码摇了电话。

“喂，”听筒里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喊，“您找谁？”

“我也不知道我找谁，”我回答说，“有人给我来过电话。……”

“您是阿列克赛吗？”

“是的。”

“我是萨波日涅柯娃。”

“哪个萨波日涅柯娃？”刚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想起来了，这不就是玛莎吗？我一只手捂住听筒，大声喊道：“您是玛莎吗？我刚才没有听出来是您！您好呵！玛莎！您好！”

“您好！”她回答说，声音是那样清晰明朗，仿佛她本人就站在我旁边似的。“阿列克赛，请原谅，我可能打扰您了……您一定很忙吧？”

“不不不！一点也不忙！”我说。“玛莎，您想不到，接到您的电话，我有多么高兴！”